

南京乱成了一锅粥，谣言满天飞。宋美龄在情急之中，想到二姐庆龄能帮助自己，直接挂通了电话，美龄是哭着求二姐帮忙，请求协助解危，释放蒋介石——

# 西安事变，宋美龄曾哭着求宋庆龄帮忙

## 西安兵变，美龄哭求二姐帮忙

1936年12月，西安兵变蒋介石不抗日被扣，生死不明，一下震惊了南京政府和宋美龄。宋美龄在情急之中，想到二姐庆龄能帮助自己，直接挂通了电话，美龄是哭着求二姐帮忙，请求协助解危释放蒋。

因为姐妹间十年没有来往了：当年庆龄曾说过，她宁愿看到小妹去死，也不愿小妹嫁给老蒋。就在小妹嫁给老蒋的当年，蒋就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合作破裂，政治离间了姐妹亲情。庆龄当面答应帮忙，只有一个条件：蒋要顺应潮流抗日，美龄也当场做了保证。这表明了宋庆龄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使小妹美龄大受感动。

宋庆龄说办即办，她与中共及时进行了联系，说明了自己的意愿。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宋庆龄的通知后去了南京。据说，蒋夫人在南京接见潘汉年时恳求共产党保证她丈夫的安全。

西安兵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为抗日三姐妹摒弃政见重新走到了一起提供了契机。

## 避居香港的宋庆龄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要摆脱日本特务的监视。

她的寓所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客轮。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

节。在四年时间中，这里成为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这是因为香港属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为止。

## 三姐妹团聚的真相

1940年3月，报端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进行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当时这两个组织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详细论述在这一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

但引起人们注意是文章发表的

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亡工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大背景进行的。

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团聚”。但当时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无奇不有：在香港，流传着古老的“浪子回头”的谣言——宋庆龄因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而感到“幻想破灭”，回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之中；在重庆，则描绘出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处在一种相互宽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围之中；几十年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名人的传记和电视片中又使“三姐妹团聚”呈现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景——亲人之爱战胜了一切原则上的分歧。

事实上，三姐妹对于在不很紧张的情况下聚会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仅在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就忙于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扩大势力”（即使这种“扩大”完全是在日本占领下收复失地）。它甚至于杀害根据协议派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代表。

尽管“三姐妹团聚”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它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他们想使她显得完全同意蒋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见均已消除。

但在这次联袂旅行中，宋庆龄决定担负起一项更有独立性的任务——努力加强国民党内部反对投降的趋势，呼吁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尽可能广泛地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战和民族复兴开展组织工作。（据人民网）

## 西安事变的“主谋”并非张学良

### “兵谏”是谁的主意？

1935年，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在热河战败后，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绝望。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张学良听后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 张、杨为放蒋介石大吵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来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

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宁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据《延河》）

## 宋子文日记揭秘西安事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

###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哭……”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

蒋在见面时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

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 ◆宋子文、张学良策划让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作出令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满意的答复。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以开枪打死他。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宋子文与张学良来遂策划应急出逃之策。

### ◆周恩来说服杨虎城放蒋介石

25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见蒋介石。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当天宋子文与蒋一起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据《国际先驱导报》）